



思想史研究·第十辑

Tocqueville

托克维尔与 现代政治

上海人民出版社



思想史研究·第十辑

托克维尔与 现代政治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托克维尔与现代政治 / 王涛主编. —上海: 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6

(思想史研究; 第10辑)

ISBN 978-7-208-13589-5

I. ①托… II. ①王… III. ①托克维尔, A. (1805 ~
1859)—政治思想—研究—文集 IV. ①D095.654.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2177 号

责任编辑 秦 堃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思想史研究 第十辑 ·

托克维尔与现代政治

王 涛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6.75 插页 2 字数 354,000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589-5/D · 2815

定价 60.00 元

托克维尔与现代政治

编者按 托克维尔的思与述，围绕着他那个时代法国文明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一定程度上，他所经历的变局，体现为以“现代自然正当”为诉求的现代革命。且不说，托克维尔就是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之震荡的余波之中，他本人更是亲身经历了随后的“继续革命”——1830年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这些以追求“自由、平等、人权、解放”为核心价值的现代革命，及其给法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动和深远影响，构成了托克维尔的基本问题境遇。

现代革命及其理念，为托克维尔所深深卷入的社会与政治生活确立了基本框架与情境，使得他不得不去理解、适应乃至接受其中的某些价值、原则和理念，以它们作为反省与调整革命后社会与政治的基本起点。他曾把导致法国大革命和现代民主的“平等原则”看作神意，认为这一原则在欧洲的扩展与发展已历经七百年之久，因而赋予其不可逆转的现实性。针对平等原则给自由带来的危险，他也是在接受这一原则的前提之下，寻求解决的方案。相比于同时代的顽固保守派，他则是将保守主义精神落实在新的现实框架之中。

然而，在照顾到现代精神的同时，托克维尔仍然以某种方式同革命之前的旧时代有着血脉与精神的联系，而此种联系使得他具备了一个宏阔的历史视野与比较框架，在面对革命及其塑造出的社会与政治之时，能够保持足够的审视距离，诊断出现代政治的内在缺陷与病症。托克维尔出身贵族世家，外曾祖父马勒泽布曾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国王路

易十六的辩护律师,父亲于复辟时期在多地担任地方长官。对传统的记忆、情感、理解与把握,使托克维尔能够从旧时代的遗产之中找到用以应对现代政治问题的资源和方向。

托克维尔时刻用以与现代民主的社会状态作比较的框架是贵族社会的模式,正是在相互对比之下,他发现了民主社会的诸种特征及其内在问题。他看到,民主发展具有内在的自我削弱与自我反对的悖论:一方面,民主政治形式与政治理念的落实,需要有具备政治意识与政治活力的民主人,而另一方面,民主化却使民主人去政治化,变成相互疏离的、孤立的和软弱的原子式个人。由此,民主社会状态带来的自发的、野蛮的本能将会消解民主政治形式与政治理念追求的“人民统治”的理想。民主所追求的一切,又会在民主社会中成为巨大的疑问。

其实,无论是法国的保守派,还是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信条派”,都或多或少地把握到了民主带来的新问题,但是他们都无视汹涌而来的民主大潮,仅仅把民主的缺陷当作拒斥民主的理由。而托克维尔揭示民主的问题,并不是让人们拒斥民主,而是要在民主框架之内来化解民主问题、维护自由,进而把民主的发展引导至有利于自由与文明的方向上来。同样,传统贵族社会的模式也为托克维尔提示了驯服民主、解决民主问题的办法:用结社让民主人联合起来,使之成为如同旧制度贵族一样的政治力量——“贵族人”;用基督教信仰来洗礼民主人,在提升民主人精神境界的同时,引导他们克服享乐与平庸、走向伟大,等等。阿兰·卡汉(Alan S. Kahan)将托克维尔归入19世纪“贵族自由主义”的行列并不为过。他借助传统贵族社会经验对人民统治、个人独立等启蒙价值预设的怀疑,使他成为一位新的自由主义者(a liberal of a new type)。

归根结底,托克维尔的思索,是为了探索大革命之后法国的出路。法国大革命发生在一个君主制国家,以追求“自由”、“平等”为价值理想,把创建一个实现这些自然权利的民主共和国作为革命的目标。然而,就创建新政体的直接目标来说,这场革命失败了。法国在雅各宾派

的恐怖统治中走向拿破仑专制,作为革命目标的民主共和制度,只是昙花一现,并没有牢牢扎根,得到有效运转,致使革命后法国社会经历了复辟与政变的动荡。革命后的政治乱象促使托克维尔思考民主共和制度的巩固问题,最终发现了民主共和制度的扎根、运作与巩固所涉及的法律、制度之外的因素——“民情”(moeurs)。对革命的透彻洞见以及对“民情”问题的探析,也使他与同时代各种激进潮流保持了富有深意的距离。

当民主、自由成为现代政治追求,但又难以安顿的重要问题之时,托克维尔便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恒久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他能够带来教益的,除了那些基于相似处境而给人以现实启发与警示的政论,更加值得我们重视的,则是隐含于他的民主论述背后,对启蒙政治价值乃至政治生活本身的反思。这一点使托克维尔不仅是一位民主理论家,而且是一位有关现代政治以及普遍政治的政治哲人。

目 录

托克维尔与现代政治	1
-----------	---

主题研究

托克维尔论民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张尧均	3
-----------------	-----	---

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

——托克维尔解析法国大革命	王 涛	37
---------------	-----	----

什么是“正确理解的利益”	樊熙奇	53
--------------	-----	----

托克维尔与民主世界的公民	徐 衍	75
--------------	-----	----

历史哲学与自由问题	郝春鹏	90
-----------	-----	----

《论美国的民主》的意图与结构	[美] 哈维·曼斯菲尔德、 [美] 戴芭·温思罗普	105
----------------	------------------------------	-----

《旧制度与大革命》究竟说了些什么？

[法] 弗朗索瓦·傅勒、[法] 弗朗索瓦丝·米罗尼奥	182
----------------------------	-----

研究论文

波里庇乌斯与 20 世纪罗马政体的阐释	韩 潮	265
---------------------	-----	-----

政治的超验维度

——对施米特政治神学的重新阐释	郑 琪	296
-----------------	-----	-----

柏拉图的“δύναμις”：知识与意见区分中的三个层次	唐 杰	313
-----------------------------	-----	-----

访谈

托克维尔与新的自由主义

——哈维·曼斯菲尔德专访

王 涛、[美] 克里斯托弗·巴克 331

经籍点校

張錫恭《周禮田制征役鄭義述》解題、點校及述評 沈 娟 363

大學古義說 (清) 宋翔鳳 371

书评

浪漫的反讽

——述评《浪漫的律令》 黄 江 405

《思想史研究》稿约

417

主 题 研 究

托克维尔论民主的 正当性与合法性^{*}

张尧均^{**}

一、民主的正当性

托克维尔承认,《论美国的民主》是怀着“一种宗教畏惧”(une sorte de terreur religieuse)^①的态度写下的,因为他把民主化的进程看作一个“神意使然的事实”(un fait providentiel)(7/Vol. I, p. 60)。在他看来,民主不仅是合乎自然的,而且是神圣的,民主的正当性就在上帝那里。

托克维尔比较了人的视点与上帝的视点的不同:

上帝决不一般地观察人类,它一瞥人类,就能分清人性中包括的一切东西,从每个人身上看到使人人互相接近的相似点和使人人互相疏远的差异处。因此,上帝并不需要一般观念。……人就

* “正当性”与“合法性”这两个概念借自施米特,我们在此用“正当性”(legitimacy)来指一种政治秩序的超验基础,用“合法性”(legality)来指该政治秩序的内在合理结构。

**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① 见[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页。由于该书中文版上下卷页码相连,故以下凡引此书文字,只随文标注页码,不标卷册,若引文有改动时,则同时标注该书相应的法文版页码。我所依据的法文版本为Tocqueville,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Vol. I & II), Paris, GF Flammarion, 1981。此处的引文据法文原文改译(cf. Vol. I, p. 61)。

与上帝不同了,人的头脑如欲对映入脑际的一切个别的东西独自进行考察和判断,马上就会陷入五里雾中,对这些东西的一切细节茫无所知。(529)

上帝具有一种整全的视野,它既观察到使人与人彼此接近的相似性和平等性,又察觉到使之相互区分开来的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正是因为如此,上帝不需要一般观念。与此相反,人却只能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去看世界;而且,他看世界总是不可避免地带着某些“前见”,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就是一些“教条性的信仰”(les croyances dogmatiques)。对人来说,教条性信仰不可避免,它们源于人的本质软弱性,因为人既没有上帝那种无所不包的宏观视野,又缺乏上帝那种洞察入微的微观能力,所以,他只能借助一般性的观念和某些预设的前提进行思考。“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不是通过相信别人的论断而认识许多事物,并接受非他本人所发现的大量真理的。”(525)

就人对其自身的认识而言,最基本的教条性信仰或许就是关于人之相似或不相似的信仰。

我们知道,托克维尔把民主社会称作一个“相似者的社会”(une semblable société),在这里,“人人都非常平凡,彼此都极为相似,所以每个人只要看一看自己,就立即可以知道他人的情况”(595)。与此相反,贵族社会则是一个由差异性主导的社会,不同的社会阶层各有其不同的风尚和习俗,有其不同的生活方式:个人与个人之间变得“如此互不相同,以致可以说,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不同的人性”(531/Vol. II, p. 23)。因此,民主社会与贵族社会对人的不同看法,是基于不同的教条性信仰的结果。

我们似乎很难判断这两种说法中哪一种更加合理,它们都只是从上帝的整全视野中截取了其中的一种视角。在上帝那里,这两种视角是完全统一在一起的,但到了人这里,它们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更主要的是,由于人的智力的有限性,每一种被如此抽取出来的视角又

进一步遭到了损害或扭曲。所以,贵族社会尽管强调了人的差异性,但它凸显的只是“某些特定的人”的卓异,只是少数人的优秀,而且这部分人的凸显是以大多数人的遮蔽为前提的。与此相反,民主社会虽然让每个人都有了显现的机会,但是,它又让这个人与那个人之间的差异消融在相似性中,从而导致了所有人的整齐划一和普遍的平庸化,作为弥补,人们最终又从这个普遍的平等和相似中抽象出一个“关于整个社会的庞大形象或关于全人类的更为高大的形象”(601)。于是,渺小而孤立的个体就被笼罩在抽象的国家机器的巨大阴影中了。

因此,如果单就这两个社会分别展现出来的人性特征来说,那么,贵族制和民主制就好像是“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人性,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缺陷,有其各自固有的善和恶……因为这两个社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它们是无法比较的”(884/Vol. II, p. 401)。也是据此,皮埃尔·马南(Pierre Manent)认为,贵族制和民主制分别代表着(或分别发展了)两种重大的“人类学类型”,两种不同类的人,即贵族人和民主人。“前者追求高贵的事物,其灵魂依据追求‘伟大’的倾向来发展,被‘伟大’和‘卓越’这些观念所推动。后者则背离伟大,拒绝卓越的观念;他追求平等,因为他的基本情感是‘人与人的相似性的情感’。”^②

不过,托克维尔仍然相信,从上帝的观点来看,“使这位造物主和人的保护者最感到悦目的,并不是个别人的高度荣华富贵,而是全体人的巨大幸福。……平等也许并不怎么崇高,但它却是非常正义的,它的正义性使它变得伟大和美丽”(884)。如果说贵族制展现了人性的伟大,那么,民主制则更能体现上帝的正义。托克维尔正是从正义的角度(进而也就是上帝的角度)来肯定民主社会的正当性的,换言之,贵族社会虽然能够彰显人之卓越和伟大的德性,但就其社会整体的制度和

② [法]皮埃尔·马南:《民主的本性》,崇明、倪玉珍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191页。

结构来说,它却缺乏正义,它是建立在不义的基础之上的。

贵族社会虽然承认了人的差异性或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却是以固化人的“不平等”,进而固化人的“等级”区分为前提的。问题是,人与人的差异性是否就意味着人与人的不平等?

托克维尔唯一承认的人的不平等是“智力的不平等”,只有这种不平等“直接决定于上帝,人们根本无法防止这种不平等的出现”(59)。他甚至把那些以智力和德行见长的人称作“自然的贵族”(58/Vol. I, p. 113)。但是这种智力的不平等并不一定导致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托克维尔看到,在最早定居在新英格兰海岸的人之间,智力的优势虽然产生了某些影响,但居民之间仍极为平等,“贵族制的萌芽,也从未被引进合众国的这一部分”(52)。

实际的贵族社会并不是产生于这种天赋的智力不平等之上的。在古代,“奴隶与其主人属于同一种族,而且奴隶的教育和知识水平往往高于他的主人。有无自由,是他们之间的唯一差别”(397)。因此,智力的不平等并不构成贵族社会的基础。欧洲的贵族社会主要产生于征服:“征服者成了贵族,被征服者沦为农奴。于是,武力把不平等强加于人,而不平等一旦为民情所接受,它就可以维护自己,并自然而然地被法律所承认。”(466)此外,导致贵族社会的阶级不平等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律对于财产权的分配,尤其是继承法:“按照一定的方式制定的这种法律,随即把财产,不久以后又把权力积聚和集中起来置于某一个人的手中,可以说,它使地上冒出了贵族。”(54)

因此,在托克维尔看来,贵族制的不平等与其说是自然的产物,不如说是暴力和立法的结果:“贵族制度为了长期存在下去,就要以不平等为原则,事先使不平等合法化,并在社会实行不平等的同时将它带进自己的家庭,凡与自然的公道截然相反的东西,只有依靠压制的办法强加于人。”(466)正是这种人为的、强制的区分把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差异凝固甚至强化为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线,它完全忽视了在他们之间同时具有的相似和联系。就此而言,贵族社会的不平等是不合理的:“纯

由法律规定的尊卑,是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大虚构!在分明是同类的人之间建立的永恒差别,是对人性的最大违反!”(398—399)而基于这种不平等的统治也是不正义的:“不可能想象再有什么比这种服从更违反自然和人心的隐秘本能了。依靠自己生存的人,宁愿经常受一个国王的专断统治,也不愿受贵族的正规行政管理。”(466)

虽然托克维尔也一再强调贵族社会所具有的“稳定、强盛,尤其是其荣耀之处”,强调贵族社会所特有的“人的尊严、力量和伟大”,强调贵族所追求的“精神上的享受”,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像帕斯卡尔那样“尽其全部智力去清晰地揭示造物主的奥秘”(562)的知识英雄,但所有这些,都只是一种人为的合理性。在托克维尔那里存在的“两种视角”——从“伟大”出发的视角与从“正义”出发的视角——之间的张力^③,绝不只是单纯的古今之别,也隐含着人的视角与神的视角之间的本质差异。贵族制源出于暴力和强制,说到底,它只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而民主制则不仅合乎自然,也是神意计划的安排和神意历史的结果;也可以说,贵族制只是一种人义论的构造,而民主制才有神义论的正当基础。仅此一点,就使托克维尔的民主观点有了截然不同于其他人的高度和视野。

二、民主的革命

托克维尔也是从民主神圣性的角度出发描述民主的革命的:“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4)这是一场身份平等的革命,它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扰,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7)更重要的是,这是一场由上帝亲自发动的革命:“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人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认识的思考,知道平等的逐渐发展既是人类历史的过去又是人类

③ [法]皮埃尔·马南:《论民主的本性》,第194页。

历史的未来,那么,单是这一发现本身就会赋予这一发展以至高无上的上帝的神启性质。因此,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个民族只有顺应上苍给他们安排的社会情况。”(8)

显然,托克维尔在这里赋予了“革命”一词某种特殊的神圣内涵。

“革命”一词本来是个天文学术语,它指的是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而当它最初被作为一个政治学术语来描述世间之事时,也主要是指使社会秩序返回某一先前的状态,回复某种预先规定的秩序,这正是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所暗含的意思,即“君权复辟了前度的正当性和光荣”。^④只是到了法国大革命期间,“革命”一词才被赋予了创新性、新颖性的内涵。当罗伯斯庇尔宣称“自然领域中的一切都已改变,道德和政治领域中的一切亦应改变”^⑤之际,他已将革命看作人类通过自己的行动开创新秩序,开启新纪元的枢机,革命从此就有了“开端”的意味。这是我们所熟悉的“革命”一词的现代含义。

无论就其自然意义还是政治意义来说,“革命”似乎都不具有神圣性。尽管作为一种有规律的回归运动,革命内在地隐含着“必然性”的含义,而当这种含义被应用到人类历史范畴中时,它又与“历史必然性”联系在了一起;尽管当革命开创一种新秩序时,它还具有一种道德和政治上的正当性和严肃性,但所有这些都仍局限在世俗的人义论层面,与神意无关。当托克维尔把导向身份平等的民主革命与自然界的运行相比拟时^⑥,他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回到了“革命”一词的原初含义,而当他把正在来临中的身份平等社会看作此前的任何社会都不能类比的全新社会时,他似乎也采用了“革命”一词的现代含义,但除了这些之外,更重要的是,他还赋予了革命以一种神义论的内涵,他明

④ [美] 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⑤ 同上书,第35页。

⑥ “不必上帝自己说,我们就能看到它的意志的某些征兆,我们只要观察一下自然界的年复一年,正常运行和事件的持续发展趋势就可以了。我们没有听到创世主的启示,就知道天上的星辰是循着它的手描画出的轨道运行的。”(8)

确地把民主革命看作上帝意志的贯彻和实现。

与人的革命行动相比,这场由上帝所引导的民主革命看起来更幽曲,更复杂,也更漫长和持久。托克维尔差不多是从中世纪中期(11世纪)开始追溯这场革命的:“十字军东征和几次对英战争,消灭了十分之一的贵族,分散了他们的土地。地方自治制度,把民主的自由带进了封建的君主政体。枪炮的发明,使平民和贵族在战场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印刷术向他们平等地提供精神食粮。邮政既把知识送到穷人茅舍的柴扉,又把它带至王宫的大门。基督教新教宣布所有的人都能同等地找到通往天堂的道路。美洲的发现,开辟了千百条致富的新路,使一些无名的冒险家发财得势。……”(6—7)总之,“可以说我们在过去的七百年里没有一件大事不曾推动平等”(6)。但尽管如此,这场民主的革命依然没有完成。

上帝计划的宏伟之处也在这里。托克维尔如此比较上帝的计划与人的计划的区别:

人认为统一性观念的伟大之处在于手段,而上帝则认为在于目的。结果,这样的伟大观使我们只注意无数的小事情。强制所有的人都同步地走向同一目标,是人的观点;而引导不可胜数的千变万化的人开始行动,并要把他们的行动结合得使所有的行动能通过数以千计的不同道路去完成一个宏伟的计划,则是上帝的观点。(892/Vol. II, p. 407)

上帝暗中牵引着或驱使着无数的人去实现其高远难测的宏伟目标,而人只是其自愿或不自愿的工具:“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自愿帮助民主获胜,还是无意之中为民主效劳,不管他们是自身为民主奋斗,还是自称是民主的敌人,都为民主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都汇合在一起,协同行动,归于一途。有的人身不由己,有的人不知不觉,全都成为上帝手中的驯服工具。”(7)